

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

主 编 | 纪宝成

执行主编 | 黄朴民 梁 涛

梁 涛 顾家宁 编

国学问题争鸣集

(1990—2010)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获华民慈善基金支持

梁 涛 顾家宁 编

国学问题争鸣集

(1990—2010)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学问题争鸣集(1990—2010)/梁涛,顾家宁编.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
(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
ISBN 978-7-5495-0001-7

I. ①国… II. ①梁… ②顾… III. ①国学-思想史-
中国-1990~2010 IV. ①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660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组 稿:郑纳新
责任编辑:胡 波
装帧设计:孙豫苏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16

印张:31.25 字数:510千字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6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本书获华民慈善基金支持

《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编委会

主 编

纪宝成

执行主编

黄朴民 梁 涛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立天 冯其庸 庞 朴 张岂之 张立文 李学勤 傅璇琮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卜宪群 干春松 马克锋 王子今 王炳华 乌云毕力格

纪宝成 孙家洲 刘笑敢 吴 光 陈 来 陈启云

杨庆中 沈卫荣 孟宪实 徐 飞 袁济喜 梁 涛

黄朴民 黄克剑 诸葛忆兵

总 序

纪宝成

—

本世纪初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所引发的“国学热”，既是一场民族文化的复兴运动，也是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国学既是“国魂之学”也是“学科之学”。

对于何为国学，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一是认为国学是我国固有之学术。这主要是就国学的内容而言，认为国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这是最常见的看法。二是认为国学并不完全等于传统学术，而是近代学者受西学的刺激，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传统学术的研究、整理，它强调的是世界眼光、现代意识。三是认为国学是“国魂之学”，是一个国家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基础，强调的是国学的价值和意义，它与古代“欲亡其国，先亡其史”的说法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我们看来，这三种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国学研究总是要以以往的历史为对象，离开了传统学术，国学研究就成了“无米之炊”，国学也就不成其为学了。但我们今天研究国学，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以现代的理念为指导，充满明确的创新意识和与时俱进的当代精神，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一种“重构”。从知识上来说，今天的国学应该是更有体系、更有条理，更符合现代学科的要求。同时它又是“国魂”之学，应承担起民族文化重建的使命。

近百年来，由于中华民族遭受到一系列屈辱与挫折，国学的地位遭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否定，国学的意义遭质疑，国学的未来遭抹黑，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是不少知识分子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伦理等。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杀，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们决不

能简单地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几千年连续不断、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及其价值体系,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等,在战胜外来列强,赢得民族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腾飞和崛起中发挥了积极的、无可比拟的作用。一个人没有灵魂,只能是行尸走肉;一个国家没有魂魄,也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说,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国人主要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破”的话,我们今天则是要在“破”的基础上着眼于“立”,继承传统国学的优秀、活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近代以来科学、民主的先进思想,重塑“国魂”,再造中华文化的当代思想体系。“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国学”是文化之根,是民族之魂。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决不能成为无根的民族,而应当在历史的亘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多元文化的激荡中确定自己的地位,在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迈出自己坚定的步伐。

我们视国学之为“国魂之学”,是因为国学本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精神故乡,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城,是我们伟大民族顶天立地的思想根基、力量根基,也是我们不可战胜的强大自信心的精神源泉。只有国学才可以更好地反映不断变化的“中国形象”,清楚说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告诉世界“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国学才能客观地描述中国思想、文明和精神的真实状况,说明影响和决定国人行为的内在体系,以及它如何有效支持国家“硬件”的运行。为什么目前社会上“国学热”,而不是其他学科的“热”?这最好不过地说明,国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重振国学是顺乎天,应乎时,合乎民。当我们一些学者纸上谈兵,喋喋不休地质疑国学的合理性时,广大群众却早已回归国学、接受国学、热爱上国学,因为国学就是他们的精神信仰、生活方式、处事原则,他们需要国学,离不开国学。我们相信,随着国学研究和普及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会接受国学,国学会更好地发挥塑造民族之“魂”、“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的积极作用。

“国魂之学”意义上的国学可以是广义的,主要表明了一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立场,凡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包括文史哲的学者,只要是对传统持同情的理解,抱有弘扬的态度,都可归于国学的旗帜之下。从这一点讲,国学不同于一般的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研究可以是“价值中立”的,甚至是批判的态度,或者是纯粹整理国故的心态。而国学研究则首先需要一种自觉的担当精神,一种强烈的弘道意识。从事国学的人虽然也对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进行批判,但其最终的目的却是为了“返本开新”、“推陈出新”,是为了弘扬、重建中华文化。因此,国学的提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意义重大。它既是对党中央关于弘扬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精神的响应,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学的需要,同时还在广大人文学者中形成一股凝聚力,树立起一面旗帜,将大家统一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来。

二

国学不仅是“国魂之学”，同时也是学科之学。作为“国魂之学”，国学可以是广义的，具有旗帜、统合的作用；而作为学科之学，国学又是具体的，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内涵和课程设计，处理好与其他人文学科尤其是文史哲的关系，是国学健康发展的关键。

国学本是个世纪初一些学者为保存我国固有学术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但面对西学的强势地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如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等，又纷纷接受、采用了西方分科的方法对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进行分类，一般分为文、史、哲，加上语言、文字、民俗、考古等。这样国学就成为一个过渡阶段，逐渐让位给以文、史、哲为代表的现代学科。不可否认，当时人们采用西方学科体制对国学进行分类有其合理性，文、史、哲等学科在传承古代文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我们有必要回过头对文、史、哲的现代学科进行反思，检讨其中的问题和弊端。如学者指出的，中国传统学术是整体之学、博雅之学、汇通之学，强调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注重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将其放在“西学”的学科门类之下，必然是削足适履，摆脱不了肢解“国学”之弊。例如，经学是中国文化之根，规定了华夏文明的大本大源，塑造了华夏族群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塑造了我们祖先共同的生活方式。但在文、史、哲的学科体制下，《诗经》变成文学，只能探讨《诗经》中的艺术特色，考证《诗经》中的鸟兽虫鱼，而三家诗、毛诗所体现的诗教精神，三百篇之所以成为“经”的精神，则基本上被排除在外。更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仪礼》这些经典完全被排除在现代学科视野之外。而恰恰是这些经书，在历史上曾经对政治的改革、制度的建构、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但由于它们和现代学科基本上没有重合之处，以至于长期得不到研究，这不得不使人发出“数典忘祖”之叹了。还有，子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古代诸子对社会人生的见解与思考，包含了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科技等丰富的内容。与经学不同，子学不是对经书的诠释、解读，而是通过个人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体验，提出系统的思想主张、见解及社会改革的方案，故子学是传统文化中最富有创造力，内涵最为丰富，也最具有个性魅力的部分。但在目前的教育中，子学被分割到文史哲不同学科之中，文学系将《论》《孟》《老》《庄》当文学作品看待，探讨其艺术风格、文体演变；哲学系则将其看做儒、道的哲学经典，研究儒家、道家的思想发展；历史系则将其当史料看待，钩沉其中的人物、事件，结果只能是得其偏，难窥其整体之美，完整的子学被活活肢解。

其实，以西方的学科分类为标准，把西方看成是现代学科的典范，我们目前的学科分类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西方除了文、史、哲的学科外，还设有古典学，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做整体、综合的研究。这说明，中西古代文化具有相似性，它们都亦文亦

史亦哲,都具有圆融、整全的特点,不可做简单的分科研究,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学科,采取综合式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其堂奥。国学学科的地位和作用,与西方古典学相似,都是对文、史、哲分科的一种补充,是对我国固有学术中那些不能简单地分割到文、史、哲学科中的内容,如经学、子学等,一种整全的研究。

现代教育有一个综合、交叉的趋势,我们不否认文、史、哲分科的合理性,但在这个基础上还应新的综合,国学学科的设立,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综合的作用。人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其实文、史、哲本来就是现代学科分化过程的产物,不存在分家不分家的问题。大家之所以这样讲,意在重申其源头本来是一个整体,应该有综合。但分科既已形成,想要综合已非易事,故海内外许多高校都设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之类的机构,目的就是为文、史、哲等学科的综合、交流提供一个平台。我们认为,设立国学学科,成立国学院,可以更好地促进学科的融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设有国史、国文等专业,但它与历史系、文学系中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专业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更强调经史、文史的会通,打破学科的壁垒,真正继承古代学术的优良传统。所以国学学科一是可以弥补文、史、哲的不足,避免对传统学术的肢解、割裂之弊,二是可以促进文、史、哲的沟通与融合,使其真正做到“不分家”。

总而言之,文、史、哲等学科贡献很大,必须肯定;现行的学科体制存在弊端和不足,有必要改革、完善。而设立国学学科,正是改革、完善现有学科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

三

从清末民初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今天,国学的发展经过了几次高潮,其间的起起伏伏,值得人们总结和深思。我们将几次国学运动中的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为现代学术、民族国家、经学、子学、国文以及焦点争鸣等题目,编写这套“近现代国学资料丛书”。这套丛书虽然只是资料的性质,但同时也包含了编者对国学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沉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建立就曾学习、借鉴以往国学机构的经验,国学先行者的实践是我们一份宝贵的财富,继承并超越前人乃是我们的目标。

最后,我要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关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发展,并给予热情帮助的朋友表示深深的感谢!并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国学,支持国学,使国学事业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为中华学术的繁荣发展添色增光。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五日

国学：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代序）

顾家宁

“国学”二字，可谓最近十余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第一大热词。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国学热一直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国学”是什么？于当今社会究竟价值几何？弘扬国学与五四启蒙是否矛盾？这些跨越世纪的追问，一直是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知识人认真思考的大问题。

毫无疑问，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固有之学。按照胡适的理解，国学即以中国过去一切的文化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故学”。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故固然构成了国学的研究对象，但国学之兴，却又更多地源自晚近以来西方文化的照鉴与刺激。因此，国学概念不仅在内容上包含着时间维度之“故”，亦在态度与方法上关涉着空间维度之“西”，“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① 因此，与其说国学是传统学术文化的绪余，倒不如说它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是传统学术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身位置的一种努力。也正是这一时空交错的彷徨，决定了国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必须在古今中西的复杂坐标中寻找栖身之处的困顿处境。

西方近代的问世，首先是近代精神获得普遍的心灵认可，然后才是它以理性的方式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散射：文艺复兴使人作为精神的个体被重新发现，宗教改革则把被解放出来的生命冲动引向新的秩序，个人主义与理性主义从而携手使文化启蒙完成了向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衍伸。最后，物质文明的源源流出不过是水到渠成。中国则反其道而行之：从“技”的自觉，到“政”的反省，再到“教”的重建。如果说西方步入近代之径属于精神所藏的头脑先探出母体的顺产，而中国则不啻为一种首足倒置的难产。^② 被动的后发处境，使得中国在步入近代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更多的难题，遭遇更大的挑战。在步入现代的蹒跚步伐中，传统学术文化在“道”的层面必须面对启蒙思潮的诘问，在“学”的层面必须接受现代学科建制的重构，在“政”的层面必须经历自由民主的洗礼。特殊的时空背景决定了国学之争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或文化论争，其关涉的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早已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紧紧缠绕在了一起。在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浪潮中，国学能否在变化的时空中守护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又能否摸索到自身通往现代文明的入口？这些事关民族文化生命的重要问题，曾是百余

① 许守微：《论国粹无碍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② 参见黄克剑、周勤：《寂寞中的复兴——论当代新儒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页。

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人致思的焦点所在,尤其近二十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文化复兴之于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开始越来越明确地显示出来。今日国学之争,绝不只是一种书斋中凌空蹈虚的文化遐思,而是在古今中西的时空背景之下对中华文明未来的发展之路所做的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

思潮脉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学热”绝非起于一夜之间,而是有着长期的酝酿和发展过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文革”结束后意识形态禁锢的逐渐松动,中国兴起了一场民间自发的文化热潮。对“文革”深层背景的反思构成了这场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内在动因;打开国门后如潮水般涌入的各种西方思潮,则成为人们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热”中,尽管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但起着统合、引导作用的主流思潮无疑是“西化论”。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改造、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吸收,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化思潮的激进主流,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著名的电视专题片《河殇》。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时代背景使得人们逐渐以一种更加冷静和客观的方式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随着中国社会在历经波折之后开始步入持续的经济增长,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及对传统中优秀成分的阐扬日益增多。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的署名文章,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该文被视为九十年代“国学热”兴起的标志,《光明日报》、《文汇报》等纷纷以类似的报道跟进。随后,中央电视台做了题为“北大‘国学热’的启示”的专题报道,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摄制的电视片《中华文明之光》在海内外播放,一时蔚为大观。与社会文化的步调相一致,学术界关于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讨论也日渐升温,季羨林先生提出著名的“东方文化世纪说”,引出各方观点争鸣,部分学者认为,国学热的倡导者可能存在意识形态目的,“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①于是,在意识形态的警惕与追究之下,九十年代“国学热”遂温度骤降,戛然而止。

九十年代第一次“国学热”虽因外部因素而夭折,但其反映的实质乃是经济发展、综合国力日渐增强之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这一内在发展趋势是一以贯之的,绝非外力所能压制和消解。因此,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不久,新一波国学热潮便合乎逻辑地再次展开。在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的2004年,围绕儿童读经展开的争

^① 罗卜:《国粹·复古·文化——评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倾向》,《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本书有收录。

论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成为了思想文化界的两件大事。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将传统文化之争引向高潮，一时间论战激烈，意见纷呈。如果说十年前的第一次国学之争更多地继承了八十年代“文化热”的遗风，那么这一次的国学论争无论在问题的广度还是学理的深度上都有了极大的拓展。除了“要不要做”的争论之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怎么做”的问题。在论题上，启蒙与国学、国学与现代学术、国学与当代文化、经学与国学这样一些具体而重要的问题明确地凸显出来。在趋向开放和多元的文化氛围之下，国学之争得以按照思想与学术自身的理路前行。2009年，围绕着国学学科建制问题，学界再次就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之上。

新世纪的“国学热”正方兴未艾，由此展开的各种争论，其中心问题在于在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从前现代向现代、从现代向后现代转变的双重语境中，为传统文化寻找正确的价值担当，进而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使之成为促进社会进步、民族复兴的精神之源。倘若落实到具体的问题领域中，则大致可以道、学、政三大板块范围其间。

“学”的重构

从“学”的维度上看，国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使传统学术文化的面貌得到更加完整的呈现；另一方面，亦可能为当代的学术文化重建提供新的知识生长点。

国学本身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一般说来，国学大致被理解为以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内容主要包括经、史、子、集四部之学，融合儒释道法诸家，其中又以儒学为主体。另一方面，倘若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考察，那么“国学”概念的兴起亦离不开近代以来与西学的比照。

与传统士人的生活情态相表里，中国传统学术重和合不重分科，主张天地人、道学政之贯通。与此相反，西方学术则重分别，每一学科之建立，必先严格界定其研究范围与方法。与此相适应的，则是现代大学制度中分门别类的学科体系以及置身其中、以学术为业的职业学者。近代以来西学东渐，西方现代学科体系与学术机制在中国落地生根。随着文学、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建立和成熟，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模式逐渐为新兴的西方学术分科所代替。传统学术不复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是被视作具体的知识对象分散到不同的学科门类之中。不可否认，新的学术机制与学科体系激发了传统学术新的生机：学科化的区分引导了新的研究路向，使传统学问获取了新的知识生长点，而系统的学科体制的建立，则使传统学术完成了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对接，使中国固有之学在新的时代获得了存续的合法性。

然而，任何转型都必然伴随相应的代价，随着学术分科的日益细化，以西方学科体系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

西方学科体系渊源有自，非为中国学术量身定做。因此适分科之履，就不能不削

自身之足,众多难以为现代学术分科体系所包容的传统学问,不得不被暂弃在学术园地之外。传统四部之分严格说来只是书籍的归纳法,如果说史部与史学、集部与文学的对接尚且差强人意,那么传统经子之学与现今的“中国哲学”学科之间就不能不多有扞格。首先,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已经充分凸显了“中国哲学”范式与传统学术之间的张力,本书中景海峰先生的《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是何种关系》与彭永捷先生的《超越合法性危机与重整国学》对此均有深入探讨。景先生认为二者恰成互补,国学之长在于其丰富的涵容度、复杂性和现实感;而中国哲学的优势在于其知识范型,因此重要的是使二者找准各自的位置、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形成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合力。^①彭先生则更关注西方学术分科区隔下中国人文学术主体性与创造力缺失的问题。国学学科的重新设立,既是对文、史、哲的必要补充,也将使我们在人文学术领域获得更多的选择,进而有可能恢复自身的话语系统和创造能力。^②

其次,传统学术中地位最重、影响最大的经学因为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厕身之地,如今已不免有消亡之虞。本书“经学与国学”一章中所选取的一系列文章,分别从学科、价值等角度探讨了经学式微的历史原因与现实影响,并对经学在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了预期。

郜积意先生在《经学的缺席:失落了的国学研究》一文中不无感慨地谈到,“我们一旦失去了经学这一强调经典神圣感的支柱,又去哪儿寻找呢?没有经典神圣感,人文精神又从何谈起?或许经学的衰微只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重新找回我们文化经典神圣感的资源。”^③由学科建制所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其影响所及在深度和广度上已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学科本身。以往垂法万世的经书走下神坛,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普通的史学材料和文学作品。盲目膜拜的去除固然是理性的进步,然而,现代学科之网在扫除圣典崇拜的同时,是否也可能过滤掉了中华人文精神的根基?在为传统学术注入新视角的同时,是否也拆解了其作为一个有机体在整全的意义上存续和发展的可能?

以传统学术的眼光看去,则周易、中庸绝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哲思,诗三百并非单纯是文学的歌咏,春秋、尚书更不是固化的史料。传统儒家强调立德功言,是为三不朽,对于儒者而言,儒学绝非只是一套由系统理论构成的纯粹知识体系,更是生命价值之来源,政治变革之助力。而在现代学科体制中,经典业已变成一堆僵死的历史材料,曾经整全的传统学术被不同的学科肢解为一堆问题的碎片,彼此之间渐行渐远,难以交接。今日传统学问的发展诚然需要现代学科视野的切入,然而,倘若因此而失去了一种整体性的观感和把握,那么这样的切割又是否有得不偿失之嫌?细致的学科分类保障了学科的专门化,推动了具体知识的进步,但其弊端在于难以从宏观上去开拓学科

① 参见景海峰:《国学与中国哲学之间是何种关系》,本书有收录。

② 参见彭永捷:《超越合法性危机与重振国学》,本书有收录。

③ 参见郜积意:《经学的缺席:失落了的国学研究》,本书有收录。

的新领域。传统学术是一个有机整体，对其中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分类研究固然必要，但倘若学科的切割最后却造成了传统学术有机体本身生命力的消亡，那么无论整体还是部分就都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况且在经历了分散切割之后，传统学术的意义世界极易被连根拔起，如此一来，其所承载的人文精神的式微也就是势所必然。

因此，建立国学学科的价值不仅在于思想的传承，更在于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共同体的可能。这一新的学术共同体或许能够提供一种整全的视野，使成为碎片化“游魂”的传统学问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让那些为现存学科体制所遗漏的知识和精神遗产能够各归其位。如果说现代学术的发展趋向是日趋细化的“分”，那么传统学术的旨趣则是一致百虑的“合”，正如国学概念本非因循仿古的产物，国学学科的创设，亦不是要否定现代学科体系的价值或是在既有的现代学科之上叠床架屋，而是希望在现代与古典、分科与整全两种传统学问的研究方式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使古典与现代在相互比照、相互批判中互相补益，从而在更加完整地呈现中华古典文明风貌的同时更好地形塑中华文明的未来愿景。

“道”的重建

国学热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当下中国人价值信仰的群体性缺失，因此“道的重建”无疑是国学所须承担的重要使命之一。首先，国学院、国学学科的学科机制创新有可能为“学以载道”的中华学术传统注入新的生机；其次，国学经典意识的强调，亦有助于华夏人文精神的重塑。

传统儒学强调知行合一，儒者在朝美政，在乡美俗，发挥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为学为道须臾不离。时过境迁，当下儒学业已成为教研机构中认知的对象，学者更多地也只是以一种知识生产者的身份出现。虽然儒学史上“德性之知”与“闻见之知”素来有别，儒学知识化带来的价值蔽障之危险亦是历来儒者争论的焦点，然而站在今日社会的背景之下，“道的缺失”已经绝不仅仅是一个儒门范围之内的问题。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定义，现代化的最大特征就是世界的理性化与智识化。理性化的实质是抽象价值的消退，人们的行动不再关涉到抽象价值，而仅仅基于当下最为直接可见的目的，并考虑如何以最简捷合理的方式予以实现。以其行动理论的术语言之，就是目的理性逐渐脱离了价值理性，行为手段代替了目的本身。由此，展现在现代人面前的是一个“祛魅”之后的世界，一个理性化的“铁笼”，一幅逐渐丧失意义的图景。

形上之道的缺失，必然导致形下世界中德的衰微。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清醒的韦伯以先知的口吻发出了极富悲剧感的哀鸣：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大发展的终点

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的情绪的掩饰之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述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妄想着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①

无独有偶,中国思想史上亦有所谓的“黑夜命题”：“天不生仲尼,万古为长夜”。所谓“长夜”,指的正是仁、义、礼、智、信这些文明的基本价值丧失的时代。失去了精神的根基,人也就无从寻找生存的价值、生活的意义、生命的尊严,一如被弃置于没有光热的漫漫长夜。在这个时代,我们似乎不难找到“黑夜”的影子:中国人放逐了孔夫子,供奉起孔方兄,贪暴之风的肆虐,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会风气的败坏,更是道德意识的危机与价值理想的堕失。

我们当然不能将社会道德的缺失简单地归咎于现代性的发展。理性的运用、人性的解放诚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本身无需接受反思。在《超越启蒙心态》一文中,杜维明先生精到地点出了作为现代性表征的“启蒙心态”之流弊所在——把知识当作力量而非智慧,强调物质进步的意义却不管它对心灵的腐蚀。^②换言之,倘若没有价值理想的跟进,那么摆脱束缚后的人性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泛滥与虚无。近年来,“中国文艺复兴”成为人们讨论颇多的话题,其中尽管有“个体尊严”与“道德重建”的重心之争,但争论各方显然都基于一个基本的共识,即力图通过复兴社会、文化的传统,使人们走出拜物教的奴役,用价值理想塑造真正的个体尊严,催生当代中国的精神变革。由此引出的,其实是一个如何重塑精神秩序的问题。在西方,文艺复兴释放的生命冲动不久即被宗教改革引入良性秩序之中,时至今日,虽然历经启蒙与后现代思潮的轮番冲击,基督宗教仍然以一种建制化的形式在精神价值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中国,一方面内忧外患之下“救亡”的急迫使“启蒙”失去了应有的从容条理;另一方面,以往承担这一职能的儒学由于其即世化的特征,因而在急剧转型的社会中难以找到新的安身之地:没有教堂这样制度化的依托,书院讲堂也已成为昨日遗迹。我们固然可说儒门本有“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紧张,但道与学从未打成两橛,毕竟不出“学以载道”的范围。相比之下,以“求真”为目的,遵循“价值中立”的现代学术却并没有给“载道”留下太多的空间。对西方人而言,这或许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在大学之外,教会同样是精神价值的承载者。同是宗教研究,大学侧重知识的研究,教会注重信仰的传承,二者相得益彰。反观中国,一旦学术

①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3页。

② 参见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本书有收录。

放弃了“载道”的品格,那么整个社会就会立刻面临价值载体崩解的危险。在今日中国的特殊语境之下,以“国学”为载体重新思考“学以载道”传统的价值,重新构建“学”与“道”的互通,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探索性工作。

社会道德的重建诚然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法律、制度、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的道德良知不可能仅仅建立在法律的规训惩戒之上,也不可能单单扎根于“交相利”的功利计算之中。一个社会统一体的道德源泉,只可能为社会成员共同的精神家园所滋养,一旦失落了精神的根基,那么制度、法律的大厦在物欲的侵蚀下势必成为沙中之塔。今日西方发达国家中人们对个人信誉的重视,表面上看是健全的社会制度与法律规范的结果,然究其根源,实不离其深厚的宗教文化传统。上帝是每个人良心的监护者,人性的阴暗面不仅为世俗律法的实用理性所约束,更受到超越价值之精神制约。如果说现代性浪潮对人之精神秩序的冲击是全球性的问题,那么其可能导致的人性横决之恶果在中国就显得尤其严重,因为我们既缺乏维系社会道德所需的发达社会资本,固有的精神价值在历经浩劫之后亦面临被抽空的危险。如果说社会资本尚能通过物质的增长逐渐积累,那么精神家园的丧失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长远损失。人文精神的缺失意味着内心精神资源的匮乏,所以才有可能使外在的物欲成为压倒一切的宰制力。对于一个有着深厚文明积淀、有志于为人类文明贡献卓越价值的伟大民族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加长远而深刻的忧患。因此,对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今日中国而言,“道的重建”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现实而迫切、事关民族前途命运的要务。

正如余敦康、姜广辉、梁涛诸先生在《儒家经学的历史作用》一文中谈到的,任何伟大民族的精神家园都离不开其文化经典的滋养,正如《圣经》之于西方,《古兰经》之于伊斯兰,《奥义书》之于印度教。经典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维系着族群的身份认同。^① 经典之中包含的不仅是知识,更在于文化的神圣感,其意义远超过一般学术的求真。今天,中国人若想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根本上无法绕开对自身文化根源的意义发掘。“修齐治平”的君子理想、“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父慈子孝”的家庭伦理、“以义制利”的价值取向、“舍生取义”的生命抉择……这些经典精神的光热,曾经守护中华民族走过无数漫漫长夜。没有它们,很难想象中华文明能够延绵数千年而不衰;缺少了它们的滋养,将来的我们注定只能生活在价值的荒原与精神的他乡。因此,国学复兴所承载的另一重要意义,就在于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经典意识,以之作为重塑文化神圣感、重建中华文明精神家园的基本资源。

① 参见余敦康、姜广辉、梁涛:《儒家经学的历史作用》,本书有收录。

“政”的再思

百余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最大挑战来自五四以来“德”、“赛”二先生的质问。“封建专制”、“王权主义”等语汇,每每成为很多学者对中国文化“一言以蔽之”的本质主义概括。在很多人看来,传统文化仿佛就是专制、愚昧的代名词。无需否认,与崇尚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相比,传统文化固然有着诸多需要反思之处,在救亡图存、不破不立的特殊年代,通过猛烈批判传统的惰性为手段来鞭策社会变革亦不失为一种合情合理的手段和策略。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我们已经有了更加从容的思考空间,那么,我们又是否应当以更加冷静平和的心态来重新审视那些可能曾经被简单处理了的复杂问题呢?

“传统”是一个宽泛而模糊的概念。传统本身具有多样性,不仅儒墨道法各家之间观点各异,即便同一学派内部,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也可能产生截然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亦会随时代而流变,因此任何时代都不可能是一个清一色的统一体,而是由不同文化质素构成的复杂混合物。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所说,“一个总括性的传统可以离弃某些独特的因素,随后这些因素又成了相对独立的传统”。^① 因此,任何对中国文化的特征的总括性描述,其实都是一种选择性的构建。不同的价值选择标准,反映的其实是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我们一直提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辩证二分法,正常情态下,“去其糟粕”只是必要的前提和手段,“取其精华”才是最终目的,然而在长期的实际运作中却产生了颇为悖谬的结果:对糟粕的批判往往遮蔽了对精华的汲取,造成目的与手段倒置的迷局,其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缺点在民族记忆中被不断强化,而闪光之处则渐渐销声匿迹,不为人知。对传统文化的隔膜、误解,乃至本能性的拒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传统的多样性决定了我们对它的认识必然有所选择。正因如此,我们更需要有一种健康思想的支配下去探索古典世界。倘若我们只是画地为牢,一遍遍地重复和强调古典世界中那些阴暗、专制、昏乱的场景,那么这样的传统研究丝毫无益于社会人生。这样的研究越发达,我们民族所背负的精神苦难和存在绝望就越深重,犹如希腊神话中背负咒石的西西弗斯,永远深陷在苦难与绝望的循环中无法自拔。这一研究立场与方法上的问题,也正是 2009 年末国学学科之争的焦点所在。

自由民主无疑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甚至是核心维度,因此对传统的负面因素进行反思自然十分必要。但正如秋风先生所指出的,彻底反传统主张的悖谬之处,在于它为中国的民主转型设置了在道德、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全盘西化这样一些不可能的前提,从而使原本可欲的民主进程变成了永远可望不可即空中楼阁。^② 而在

①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

② 参见秋风:《假定古人是正确的》,《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6月27日。

《开放的传统：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一文中，刘军宁先生对“传统”的内涵作了深刻的剖析：“传统”本不是某种决定论笼罩之下的固化体系，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存在，而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条流动的长河。对传统的认知一方面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判断，反过来，“现在”又以其价值选择塑造着传统未来的方向。^①因此，一个看似悖谬的事实是：只有知道了如何创造传统，才有可能知道如何创造未来。如果说五四对专制政治的批判和解构构成了对传统政道的第一重反思，那么今天我们似乎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开始进一步的探索，即将思考的重心从“破”转向“立”，从传统中发掘那些自由的因子，以之作为接纳现代政治文明的本土资源。帝王政治或许确是秦以来中国政治实践的主流，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无视那些君权威压之下悄然生长的自由理性之种子，比如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教授曾指出，在儒家的“道统”观中，其实包含着以道德精神抗拒政治强权的自由主义传统^②；一些学者通过思想史、政治史的研究，发掘出宋儒学术论争背后隐含着确立最高政治纲宪以制约君主意志的努力，以及北宋成熟的文官政治中蕴含的“准宪政”结构^③。这些，都是破除以往研究中的名相之分，试图对古今中西观念进行双向甚至多向互补性解释的有益尝试。事实上，正如秦晖先生曾多次指出的，在那些真正的“醇儒”看来，自由民主与传统文化之间从来就不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清末儒者开眼看西方的时候，最令他们震撼的并不是什么船坚炮利铁舰成行，而恰恰是民主的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更合乎三代政治的最高理想。^④倘若时至今日，经历了百年反思之后的我们仍然一味用批判代替建设，在固化的思维窠臼里打转，则未免误筌蹄为鱼兔，空负了五四前贤的一腔热血。

建设性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化“倒贴金”。我们无须讳言中国传统中民主观念的缺乏、权利意识的淡薄；亦无须过分偏执于自家遗产，认为必须从传统的道德理想中方能开出现代自由民主之新枝。因为传统本身就是多元的、开放的、演化的，所以在健康心态的指导下，我们尽可以大方地承认自己的不足，吸取借鉴其他传统中的优秀素质。通过内部发掘外部引进，传统的各部分亦会不断进行自我修正，自我调整，从而自然淘汰其中那些劣质、野蛮的因子，继承发扬那些自由、恒久的价值。

向自由与现实开放，亦不会导致传统文化自身的消融。一方面，正如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所指出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国家理论，其意义在于为不同的价值观念提供一个和平共存的政治架构^⑤。如果我们从这一意义上来

① 参见刘军宁：《开放的传统：从保守主义的视角看》，本书有收录。

② 参见【美】狄百瑞：《中国的自由传统》，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③ 参见卢国龙：《宋儒微言》，华夏出版社，2001年；龙昇：《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贵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7期。

④ 参见秦晖：《在继续启蒙中反思启蒙》，本书有收录。

⑤ 参见【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